

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

刘兆发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农村

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

刘兆发 著

● 经济管理出版社

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

刘兆发 著

经济 管 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苏全义

技术编辑：蒋 方

责任校对：贾全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刘兆发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ISBN 7-80162-444-0

I. 农... II. 刘... III. 农村经济—分析—中国 IV. 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445 号

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

刘兆发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国马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178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162-444-0/F·428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通讯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联系电话：(010) 68022974

序

刘兆发的博士论文——《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即将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值得欣慰。借作者邀我为该书作序之机会，谈谈对此书的看法并与广大读者交流。

此书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为依据并在此提出了新的框架——非正式结构来考察中国农村社会与变迁的一部新作。农村社会分工和交换相对不发达，商品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交易的范围狭小，大量的交易属于重复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加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环境强化了社区内共同的信仰、习惯等，强化了共同的地方知识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而，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可以被称之为以人格化交易为主流的社会。

在人格化的交易环境中，能够形成“承诺可信”机制并由此产生“合作剩余”。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盛行的农村社会中，非正式结构根深蒂固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作者以这一预设为基点，以中国农村特殊的人际关系、民间借贷、社会保障为主要线索，对非正式结构在农村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展开了深入具体的经济分析。虽然非正式结构在农村社会占主流是现实，然而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随着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由狭小的社区逐步扩大到地区、国家、全球，人们之间经济活动的交换，相应地由人格化交易为主的模式演进为以非人格化交易为主的模式。这表明，市场能够冲破血缘、地域、宗法等一切限制，最终形成以价格为机制的统一

“语言”。地方知识的交易机制将让位于公共知识为核心的普遍规制。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整个农村现代化过程就是非正式结构不断消解、整合、提升，正式结构日渐成熟的过程，并对如何削解、整合、提升农村的非正式结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构想，体现了作者既尊重现实又要超越现实的理论情怀。

当然，这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课题，受多方限制，本书也留下一些缺憾。例如，在本书中界定一些相关概念，是否准确，有待探讨；对农村的非正式结构进行整合机制的研究尚嫌理论性不足；个案分析能否包含一般结论，尚须斟酌；等等。

上述缺憾，为理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我愿作者和理论界继续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期缩小理论与现实间之距离。

王立诚

2002年6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7)
三、研究非正式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0)
四、对本书所涉及的若干概念的诠释	(12)
第二章 非正式结构的一般理论	(14)
一、组织的一般理论	(14)
二、正式组织	(21)
三、非正式组织	(22)
四、非正式制度	(32)
五、中国农村的非正式结构	(39)
六、本章小结	(42)
第三章 中国农村的特殊人际关系	(43)
一、特殊人际关系的维度	(43)
二、农村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49)
三、人际关系与企业	(55)
四、人际关系与农村劳动力配置	(64)
五、人际关系与乡镇企业	(70)
六、本章小结	(81)
第四章 中国农村的民间借贷	(82)
一、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	(82)
二、民间借贷的利率	(89)

三、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利率的一个解释	(94)
四、民间借贷的保护机制	(97)
五、惯例：一个经济学解说	(109)
六、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及其走向	(114)
七、本章小结	(124)
第五章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	(126)
一、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	(127)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难	(138)
三、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及其走向	(140)
四、本章小结	(147)
第六章 中国农村结构演进与农村社会现代化	(148)
一、从组织和制度角度看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 必然性	(148)
二、具有正激励的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 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160)
三、农村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利用和改造	(171)
四、本章小结	(201)
参考文献	(202)
Abstract	(211)
后记	(221)

第一章 导 论

本能比习俗和传统古老，而习俗和传统又比理性更古老：习俗和传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不管在逻辑上、还是心理上还是时序上说都是如此。它们既不是出于有时被称为无意识，也不是出自于直觉，更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它们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从这一意义说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它们是在这种经验中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有关事实或从对某些事物的特殊行为方式的认知中得出的理性结论而形成的。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要透视非正式结构——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等问题。理所当然要从组织与制度问题谈起。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种理论认为：组织是与人、财、物相并列的“第四大生产要素”。马歇尔（Marshall）提出，资本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于“知识和组织”中。他认为，资本主要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生产中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它使我们

能够征服自然并利用它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组织则有助于知识的发展。我们姑且不对这种理论的正确与否做出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组织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与日俱增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组织的结构和形式会不断地创新，而组织的不断创新又推动了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规模庞大、管理科学、结构严谨的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把组织的效率与否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原因所在。”^① 组织与制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组织的有效就是维护组织运行的制度的有效。

组织结构是否合理有效也是决定农村发展关键因素之一。20年来，中国农村在这方面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废除了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体制，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它是在农村资源、人口等约束条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生产组织与制度的变革而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了农村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也正是基于此事实，有关农村组织与制度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浓厚兴趣，“并使之成为不仅是当代世界经济研究的前沿，也是与当前农村经济体制联

^① 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系密切的学科领域之一。”^①

近些年来，理论界对农村组织与制度问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研究的视角主要停留在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上。而对农村的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则涉及较少，对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进行经济学方面的全方位的研究与探索仍是理论的缺憾。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是以长期历史积淀的社会“集体无意识”；^②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深层动力源；是在特定时期具有不可选择性社会发展的硬约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了解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就难以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难以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交换过程，甚至可以说难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

在中国，农村与城市是两种文明程度不同的社会。虽然在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编：《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部分。

② “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来自精神分析家荣格。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本能”是比意识更根本的思想。其著名比喻是：意识不过是大海中露出的冰川的一角，大部分无意识就像看不见的潜在大海里的冰山。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比例，而且其重要远远不如无意识。其弟子荣格进一步把个人的“无意识本能”分析引入社会，认为“无意识本能”应该分为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种，并研究了种族潜意识的性质和历史。他认为，人类自远古到现在，已有亿万年的历史，每个人都重复了人类的历史。集体无意识则是由遗传而来的，它们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在心理上沉淀下来深深地印在脑结构中的以前各代人的经验的积累与反映。集体无意识具有生理—心理结构——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的重要经历、经验等信息以遗传的方式寄存在大脑中，这是最深层次的内容并不为个体所知，然而又迫使个体此时照祖先的样式进行反应。例如，在现代社会中，有人可能产生伦乱的冲动，荣格认为这是重复人类远古时代的群婚制的经验。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由某种无意识基质——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在心理中形成的，它是由无数代代相传的共同特征所组织的，这些特征形成种族的天赋。这些种族天赋决定着我们的全部日常行为。可参见〔瑞士〕C·荣格（Carl Gustav Jung）著：《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工人出版社，1987年；《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代化过程中会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但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仍将会延续。城乡的差别并不是我这里要研究的主题，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城乡在组织与制度基础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现代化的过程的一个后果是产生了城乡差别。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和现代科层制组织摇篮，分工精细、专业化程度、经济交换中的一次性的非重复博弈占主导地位，交易主体的文化背景差异大，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交换非常普遍。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保证交易的通畅，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建立起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当然，城市中的非正式组织与制度也并非不起作用，相反，在很多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农村而言，规范化的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据此，我把城市称之为以非人际交换为主的社会^①（经济交换可以免受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影响或影响很小）。

农村的情况与此正相反，农村的分工和交换相对不发达，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交易的范围狭小，交易双方彼此熟悉，大量的交易属于重复性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加之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强化了社区内共同的信仰、

①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交换以“价格”为通用语言，是非人格化的过程，城市与农村相比更接近这一假定，所以笔者把城市假定是以非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城市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①虽然现货交易和人格化交易仍然在相当的范围内进行，“非人格化交易”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中买卖双方不一定熟悉对方，甚至都不认识对方。因此，仅靠双方信任而完成交易往往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第三方（通常是政府）来公平地执行合同。②虽然政治与经济仍然密切相关，政府与经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许多经济史学家，如诺斯和罗森伯格（Rosenberg）都把西方的崛起归因于国家在对经济人的关系上从政经不分到政经保持距离型这一根本转变。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从那时起，英国皇家的财政和经济权力开始让位于议会并逐渐退出商业经济领域。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

习惯等价值准则，形成了共同的“地方知识”。这样的交易环境可以有效地减少“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正是基于上述事实，相对城市而言，乡村可谓是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占主流的社会。我把农村称之为人际交换为主的社会^①（经济交换受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影响很大）。在乡村组织结构中，非正式结构的功能要比城市更突出。当然，这并非否认和贬低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的作用。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现代国家功能的逐步向社会底层的渗透，正式组织与制度对农村的扩张力度在不断延伸和强化。尽管如此，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于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正式组织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的差别，我们可以假定存在两种理想模型的社会，即绝对中央集权社会 and 绝对的无政府社会。

在绝对中央集权社会的模型中，国家对全体成员的经济关系、经济行为、甚至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在政治方面，国家政权规定了各阶层的地位以及政治权利义务。在经济方面，国家政权规定了微观经济组织的各种经济活动指标。在文化方面，国家政权规定了一些规则 and 标准确定了组

①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交换是非人格化的交换过程。在其假定下，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本书作者认为：要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应该突破这一假定，因为人格化的交换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特征。这里称为以人际交换为主的社会，这一假定本书的立论基石。农村市场经济的特点不仅仅是经营规模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实体之间的交易多为“现货市场交易”，即当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非现货市场交易的实现主要依赖所谓“隐含合同”，它的执行主要靠交易双方的声誉，而非第三方，比如国家。在这种传统经济中，经济人私人之间的合作和信任对交易成败至关重要。当经济活动仅局限于小的社区中，这种“人格化交易”的成本很低。但一旦超出熟人或社区的圈子，仅靠声誉和关系来交易的成本急剧上升，以至于很多交易无法实现，结果限制了企业和市场的规模。因此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这恰恰是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实。

组织的思想边际。在这样的严格假定模型中，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没有任何活动空间和余地。

另外的一种极端就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也就是非正式组织与制度一统天下的模型。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是如何有效运转的呢？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大量文献已经清楚地表明，在不存在国家和正规规则时，非正式组织与制度有相当完备的发展。在这方面，道格拉斯·C·诺斯有过精彩的论述：“不管我们是将它们称之为习惯、法律、惯例还是伦理准则，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汤加这一类的社区没有让他们的成员按自己的方式自由行事和表现每种可能的行为手段。他们在一系列规则或标准下行事，这些规则和标准确定了在各种情形下的适当行动。规则的作用一般是通过确定人们对其他同伴有那些预期来消除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它具有限制需求及允许公众评判绩效的良好效应关心。不过，即使他们这时已产生了冲突，规则也能减少冲突的机会，因为他们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更加明确界定，使模糊性总量减少了。因此，可以通过一系列特性如义理来安排人们的生活……从汤加人那里我已学到，我不应该赐予公正，因为我感到给予是一种冒犯，所有的人都不会接受。规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们只能简化生活。他们也给出了一个用于组织活动的框架。如果一个社会控制系统是在一个社区内运作的，制度标准和应用某些惩罚方式是对规则的必要补充，在汤加这类人群中，旁观者用一些绩效标准对全部人做出总的评价（对分析 Sics 时尤其有用）；这反过来又使他们能预期未来行为。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不过在另一层次上，他们将看到在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是有地方性的。在有些地方因为人们生活

于紧密的并列地带，利用相同的空间，需要相同人的支持。”^①道格拉斯·C·诺思的论述主要是说明在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下，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维持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或机制。

上述模型对于我们以后要论述的问题很有启发，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对立模型之外的第三种模型：即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混合的社会。第三种模型是我们面对的现实社会。因为典型的理想模型——绝对的集权国家和绝对的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中都不存在。

为了研究方便，这里以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农村社会生活为主要背景。个案选择上，我将以自己比较东北农村为主，同时也运用他人对其他地区的研究案例。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传统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正式组织与制度主宰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一观念受到了来自实践与理论上的挑战。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研究证明：在资本主义的正式组织与制度之外，还存在着相当厚重的低级经济层次。他提出：“直到今天，如同18世纪一样，经济大厦还有宽广的底层，据经济学家说，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里，这个底层约占全部经济活动的30%—40%。这个数字是最近估算得出的，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它是脱离市场和不受国家监督的各项活动的总和”。^②韦伯也洞察到了这一点，他说：“哪怕仅仅是纯粹的、没

^① 道格拉斯·C·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32—534页。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三卷，第734页。

有形成惯例的‘习俗’这一事实的存在，在经济上也就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经济需求水平——一切‘经济’的基础——最广泛地由纯粹的习俗所决定。个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丢掉习俗，而不会引起不赞同，然而在实际上，大多数却极难摆脱它；习俗的改变只能缓慢地通过模仿另一些某一种别的习俗来实现。”^① 卡尔·波拉尼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中指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保护他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面的个人利益；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及社会资产。”因此，“经济制度是靠非经济的动机来运转的。”^② 并考察了亲属群体、社会网络、支配着经济交易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其中的亲属群体、社会网络、经济交易中的文化传统因素都属于非正式结构范畴。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中，不仅研究正式组织与制度，而且加强了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道格拉斯·C·诺斯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对非正式制度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用他的话来说：“我对正规制约（如有人类设定的规则）及其非正规制约都有兴趣加以探讨。”^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概念非常流行，引起了社会学、经济学的注意。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

① [德] 马克思·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356 页。

② 转引自陈德庆著：《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6 页。

③ 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 4 页。

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徵有两个：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所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可能實現某些既定目標。另一位社會資本研究專家羅納德·伯特則認為：社會資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聯繫，通過它們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資本的機會，它是成功的最後決定者。對社會資本進行了長期研究并使社會資本概念引起廣泛關注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指出：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徵，諸如信任、規範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來提高社會效率。

美國社會學家瓦爾德（Andrw G. Walder）在研究了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城市中人際關係的特點，及其對稀缺資源的配置作用。他認為：“在單位中，領導者與工人存在着庇護性的非正式關係，這是鑲嵌於正式組織之中的非正式關係，是公共因素與私人因素相結合的產物，是正式組織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非正式組織是基於特殊主義的原則而建立起來的。其功能既不同於政府，也不同於市場，却在某種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對稀缺資源進行了配置”。^①

國內理論界對非正式結構的研究也逐步深入。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研究中國鄉村社會時就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已經觸及到鄉村社會非正式結構在鄉村的作用，認為鄉村存在的特殊主義的人際關係以“共同價值觀”維系着鄉村社會的穩定；樊綱在《中國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孔徑源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及其影響》中，對非正式組織與制度進

① 張繼焦著：《市場化中的非正式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非理性组织与制度的概念；李培林在《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的社会交换》和《中国社会结构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中，提出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兴起及其活力与企业的内部及其外部联系上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网有关的观点，并认为在亲缘等特殊主义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人情信用卡”，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王询在《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一书中，对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人际关系与企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并认为纯粹地就经济而研究经济难以理解经济现象的思想；朱国宏在《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一书中，提出了人际关系资源是另外一种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把非正式组织定义为：“非正式组织，主要是体现在等级次序、超越层次结构的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人际关系。”^① 段晓锋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人们很难接近市场规则或者说接近它的成本很高，迫使乡村形成一套自我调解的非正式组织及规则系统的观点。

尽管国内外近年来对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鲜有学者把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置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系统地研究，鉴于此，笔者愿意在这方面作些粗浅的探索，以期引起理论界的重视。

三、研究非正式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传统理论抓住了人是在正式组织、正式制度框架内进行行为选择这一表面事实不放，对无形组织与无形制度对人的行为选择

^① 朱国宏著：《社会学视野里的经济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